

新史学

主编 美国 范高夫
P. 范高夫
R. 范高夫
J. 范高夫

编译者 范高夫

● 上海译文出版社

Sous la direction

de Jacques le Goff de Jacques le Goff
et Pierre Nora et R. Chartier I.Revel

FAIRE DE L'HISTOIRE NOUVELLE HISTOIRE

Editions Gallimard 1974 Retz C.E.P.L.1978

根据加利马尔出版社1974年版《研究历史》
和雷斯出版社1978年版《新史学》编译

新 史 学

〔法〕 J·勒高夫 P·诺拉 主编
R·夏蒂埃 J·勒韦尔

姚蒙 编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955弄14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译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6 1/32 印张 11.75 插页 2 字数 272,000

1989年8月第1版 1989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5,000册

ISBN7-5327-0491-2/k·023

定价: 4.95元

编译者 的话

编译这么一本书是很早就有的愿望。记得刚到法国时，我在波尔多大学图书馆拿到手的第一本书就是《新史学》。由此书入门，我对法国历史学，尤其是20世纪以来的史学发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也影响到了我以后的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方向。

本书是根据J·勒高夫、P·诺拉主编的《研究历史》(Faire de l'Histoire)和J·勒高夫、R·夏蒂埃、J·勒韦尔主编的《新史学》两书编译而成。这两部书是法国史学在70年代对自身发展所作阶段性总结的产物。原著篇幅巨大：《研究历史》共3卷760多页，共有33位学者、专家参与写作。此书按史学更新的三个层次来划分：第1卷：新问题；第2卷：新途径；第3卷：新对象。《新史学》的编著比《研究历史》晚4年，是一本570多页的辞典式著作，有35位学者参与写作。如果说《研究历史》是以重点探讨的形式使人们对法国史学的一些主要进展有所了解的话，《新史学》则旨在使读者对法国当代史学主流有既深入又全面的认识：10篇长文探讨了史学的10个基本方面，100多个词条则分析了人物、概念、方法、研究题材等一系列史学的基本主题。这两部书相互补充，勾画了法国当代史学的大致图景。

《研究历史》和《新史学》两书出版后引起了史学

界与学术界的高度重视，西方国家一些重要书刊相继发表书评。近年来西方学术界都将这两本书视为重要的参考文献。有几方面原因使人们看重这两部作品：首先，法国史学自本世纪初以来经历了整体范型的更新，以年鉴学派为代表的史学新潮流推动，影响着整个西方史学形势的演化。法国当代史学在20世纪以来的西方史学界、学术界占据着一个不言而喻的重要地位。但法国史学却很少对自己进行有系统的总结。其次，自60、70年代以来整个西方史学都面临着新的分化和选择。在法国，新史学潮流业已全面渗入史学研究各领域、各流派，并取得了重大成果。但与此同时以年鉴学派为集中代表的史学方向也受到来自多方面的、程度不一的挑战，因此，总结过去、规划未来就成为法国史学家的迫切任务。正是从这一角度出发，J·勒高夫与P·诺拉在《研究历史》一书编者前言中写道：“在今天仍梦想有一个昨天的光荣和明日的荣耀这一点，并不是此书的基点，而是要去了解如何构建今天所需要的史学。作为把握过去的科学和对时间的意识，史学还应当被定义为变化的科学、转换的科学。这也就是为何这部著作希望自己不仅仅是对现时史学形势的一种总结、一种分析，它还希望指出史学在未来将面临的

程应当走的道路。这本著作不仅是对人们现时研究历史方式的反映，它还是有启示未来史学的雄心。”第三，这两本书都是有关史学家和专家协作写成的，从而既有论述的广度，又有分析的深度，具有颇高的学术参考价值。因而此书对于专业人员、历史学爱好者、社会科学理论与实践的关注者们来说都有吸引力。时隔十几年后的今天，法国还出版筒装本的《研究历史》一书，而《新史学》虽然是精装本，大部头，但销路始终很旺。

这两部作品的编辑、安排主要是由J·勒高夫负责的。他本人被视为第三代年鉴学派的核心人物，而其他编者如P·诺拉、R·夏蒂埃、J·勒韦尔也都是第三、四代年鉴学派的重要成员。由他们来主编这两部综合性作品，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年鉴学派史学对法国当代史学的影响。J·勒高夫、A·比尔吉埃尔等人曾多次强调：年鉴学派是一个创新的运动，从严格意义上说，它并不是一个学派，因此，人们可以将年鉴学派看作法国当代史学主流的主要代表。年鉴学派学派性的形成是与传统史学范型发生冲突的产物，随着史学的新范型在战后的全面确立，这一学派性也就日趋消失。也正是基于这一点，J·勒高夫等第三代年鉴学派才逐步倾向于以“新史学”一词来

称呼年鉴学派以及在年鉴学派影响下的史学新潮流。但在这两部作品中人们也可注意到，不论是年鉴学派还是新史学，在其内部都既有着历时性的变化，又有着同时性的差异。共同的史学研究倾向并不意味着单一的、千人一面的史学研究结果、途径和层次。法国当代史学不管是年鉴学派还是新史学，其理论探讨的重点始终是史学本体论、方法论和认识论，并未强求史学家工作倾向、解释机制和史观的一致性。J·勒高夫在《新史学》一书的前言中指出：“如果说新史学认定理论思考的必要性的话，那么它并不拥有任何意识形态的框框，相反新史学确认多元化研究途径的丰富成果，确认解释系统的多样性。通过这些研究途径与解释系统，我们达到了问题的统一整体。”这是新史学开放性的一个特点。但是史观、意识形态与史学认识论、方法论的关系究竟何在呢？这是两书作者未能作出回答的。也正是基于这一点，这两部作品都呈现出很强的实证倾向。可能也正是这一历史解释与途径的多元化，使读者难以把握这两部书的背景结构。这也是原著集体编写形式的缺憾之一。

我编译《研究历史》和《新史学》两书，是希望向中国史学界、学术界和一般的读者提供资料，使人们

对法国乃至西方史学的实际进展有所了解。多年来我国对西方史学的介绍、分析较偏重于历史哲学一端，从而不同程度地忽视了史学学科本身的演进状况。本译本试图弥补这一点。鉴于原著篇幅巨大，无法全部译出，故采用择要编译的方式。在编译时，笔者既注意一般的史学理论（如“史学研究活动”、“概念化史学”）、史学方法（如“历史学中的计量”），又选取了一些重要史学领域的宏观分析文章（如“历史人类学”、“想象史学”、“即时史学”等），这样能使读者了解法国和西方史学时有一个具体的视角。

感谢上海译文出版社的同志们给我这一编译本以问世的机会，感谢王晴佳同志对我的编译计划所给予的支持和帮助。此书的编译可以说是与妻子李幽兰共同完成的，从初译、修改到润色、校对，她都花了大量心血。J·勒高夫本人听说我们在编译这两部作品时，显得很高兴，主动提出要给中国读者写几句话。他衷心祝愿此书能促进中法两国在学术上的进一步交流。

这本书是集体劳动的产物。但愿它能促进中国史学、中国学术的进一步繁荣。

姚蒙

1987年10月于巴黎

中译本序

我十分高兴能向中国读者介绍这本论文选集。中国是个大国，它的历史丰富、漫长、悲壮、光荣。中国既有古老的史学传统，又有新的历史学，而这一史学也正是我们希望能通过今日与明天中法友好关系的发展更好地加以了解的。我要向中国的史学家、研究人员和历史业余爱好者致敬。我同样要感谢姚蒙先生对论文集文章所作的明智选择，从而使中国同行和朋友们能对之更感兴趣，也感谢他为编译此集子所付出的劳动。

你们将要读到的这12篇文章是在过去15年中写成的。这些文章选自两本旨在让法国与外国了解人们已经进行了的和正在推进中的史学研究新方向的著作：《研究历史》(Faire de l'histoire)和《新史学》(Nouvelle histoire)。这两本著作主要(但并非绝对的)是在两位法国史学家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和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的研究方向指导下完成的。这两位史学家从1929年起就已通过他们的著作与他们所创建的杂志《经济、社会史年鉴》而对史学研究、史学思想的更新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的杂志现名《经济、社会、文明年鉴》，我也荣幸地担任着这一杂志的主编之一。

1974年，我和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一起出版了第一

本文集《研究历史》。这本集子既注意到了史学家在叙述总体史时所遇到的不断增长的困难，也注意到了史学实践的这样一种趋势：这种趋势试图从史学一部分领域出发寻求重建历史研究科学学科。这一研究实践概念体系的理论在米歇尔·德·塞尔多(于1986年故世)所写文章《论史学研究活动》中得到了表述。我们可以在这篇文章中从一个新的角度重新看到马克·布洛赫、吕西安·费弗尔的基本观念：历史事实并不是像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实证史学家所相信的那样是“被给定”的，而是史学家根据历史的新问题、新途径和新对象来构建的。

我们在这本编译本中可读到4篇有关史学新问题的文章：1. 米歇尔·德·塞尔多在《论史学研究活动》一文中，解释了史学家的工作是如何与一个社会环境和科学实践的组合相联系的。2. 保罗·韦纳的《概念化史学》一文探讨了史学在什么条件下才能成为“科学的”，探讨了这种史学科学性的特殊本质。对于作者来说，这一科学性是由一种概念化的工作组成的。保罗·韦纳试图给年鉴学派的非事件性史学提供一个认识论的基础。3. 在《历史学中的计量》一文中，弗朗索瓦·菲雷指出了系列史的进展特征，这些进展是人们由于使用了计算机而盼望从系列史中得到的。但他同时又指出了一种盲目的计量史学的局限，这种计量史学追随了在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中滥用信息方法的时髦和种种幻觉。4. 纳唐·瓦絮代勒在《文化适应》一文中表明将一个由人类学家所创立的概念引入史学中所能带来的丰富成果，他也同时指出了史学家在使用这一概念时所应采取的预防措施。“文化适应”这一概念能使史学家研究“一系列产生于两种文化接触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现象”，在从远古以来的历史中，这类现象的重要性已越来越为人们所认识。中国历史和远东历史就是例子。此外，编译本还收入了《语言学和历史学》一

文，让·克洛德·谢瓦利埃从语言学的角度出发探讨了语言学
与历史学的关系。

除了上述5篇选自《研究历史》一书的文章外，这个编译本的
另外7篇文章选自《新史学》一书，这是一本由我和罗杰·夏蒂
埃、雅克·勒韦尔在1978年主编并出版的百科全书式的著作。
这7篇文章是从这本著作的由大量短条目相衬托的10篇有份量
的专题长文中选出的。在《历史学和长时段》一文中，米歇尔·
伏维尔分析了费尔南·布罗代尔于1958年提出的“长时段”这个
概念。这一概念描述了历史中时间节奏的多重性并优先重视了
最为缓慢的节奏——即结构的时间节奏。克里齐斯托夫·波米
安则研究了这些历史中的结构，他指出了所有现时史学应归功
于结构主义及与结构主义相区别的方面。近来史学与人种学（也
译作民族学）、社会人类学的关系促使安德烈·比尔吉埃尔写出
了《历史人类学》一文，这篇文章确切地说是为了表述对历史中
的结构层次的研究，这些研究在心态领域中获得了特别巨大的
进展。这一历史人类学的研究既涉及了如摄食方式、性、疾病、
信仰、家庭等方面，又涉及到原来意义上的心态——即一个社
会在特定时代中所具有的共同的“群体无意识”的显现。这一心
态概念是非利浦·阿里埃斯（于1985年故世）的《心态史学》这篇
文章的主题。而艾芙琳娜·帕特拉让则在《想象史学》一文中指
出了表象、形象在历史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艺术史、文学史
同样也研究想象，但在文字、形象生产的最深刻层面中，想象
并不是历史的细枝末节，而是在历史的深层生存、演进着。梦
幻史对于生活于社会之中的人的历史来说也是重要的。

史学又在历史的加速发展压力下发生了变化。在我们这个
有着飞机、电视、火箭与卫星的世界上，这一历史的加速是与
科学技术发展，特别是与信息交流、通讯发达的进步紧密相联

的。当涉及到对现时进行解释时，史学家作为研究过去的专家常常感到不甚习惯。正是一位法国著名记者让·拉库蒂尔（他在国外也享有盛名）才向我们展示了“即时史学”的问题及其种种特征。

我自己在《新史学》一文中介绍了这一深刻更新着史学的运动整体。我们给予了这个运动以“新史学”这一也许并不那么谦虚的标签。然而我已在此文中指出，我也希望在此再次指出的是：这一“新史学”如果不是追根溯源到古希腊“史学之父”希罗多德的话，起码可上溯至启蒙时代和19世纪的一些大史学家。人们可以接受或批评这些史学新方向的这个或那个方面，但其基本的一点是人们坚信历史研究应当伴随着理论思考的工作和各种方法的创建工作。应当“思考”历史学并使历史学适应于人们日益增长的渴望——这是一种在世界、社会的演进、变化中理解世界、社会的渴望。所有好的史学都是新的，因为它意识到历史在变化着，意识到历史科学也随着历史本身的变化而变化。

雅克·勒高夫

1987年9月末于巴黎

目次

中译本序	雅克·勒高夫(1)
<hr/>	
1 新史学	雅克·勒高夫(1)
<hr/>	
2 论史学研究活动...	米歇尔·德·塞尔多(41)
<hr/>	
3 概念化史学.....	保罗·韦纳(79)
<hr/>	
4 历史学中的计量.....	弗朗索瓦·菲雷(109)
<hr/>	
5 历史学和长时段	米歇尔·伏维尔(130)
<hr/>	
6 心态史学.....	菲利普·阿里埃斯(168)
<hr/>	
7 即时史学.....	让·拉库蒂尔(197)
<hr/>	
8 历史人类学.....	安德烈·比尔吉埃尔(229)
<hr/>	
9 结构史学.....	克里齐斯托夫·波米安(261)
<hr/>	
10 想象史学.....	艾芙琳娜·帕特拉让(292)
<hr/>	
11 语言学和历史学	
.....	让·克洛德·谢瓦利埃(321)
<hr/>	
12 文化适应.....	纳唐·瓦絮代勒(342)
<hr/>	



新史学

雅克·勒高夫

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Goff, 1924—)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学院。随即通过会考而获得历史教师资格证书。曾先后在巴黎大学、布拉格大学、牛津大学和罗马大学进修、学习。1954—1959年任里尔人文科学学院助教, 1959—1960年任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助教, 随后从1962年起任高等研究实验学院(E.P.H.E.)的讲师、研究主任(教授级)。这一学院从1974年起扩充改名为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E.H.E.S.S.)。勒高夫曾任该院院长(1972—1977年)。这一学院是年鉴学派与新史学的重要基地, 而勒高夫通过其著作及活动也被认为是第三代年鉴学派的核心人物。他长期担任《经济、社会、文明年鉴》杂志的编辑、主编, 还一直是国家科研委员会和法国历史研究委员会成员。

勒高夫的重要著作有:《中世纪的商人和银行家》(1955年)、《中世纪的知识分子》(1957年)、《中世纪文明》(1964年)、《为了另一个中世纪》(1977年)、《“炼狱”

观念的产生》(1981年)、《中世纪的想象》(1986年)、《交易所与生活》(1986年)。他与P·诺拉(Nora)联合主编的《研究历史》3卷本以及与R·夏蒂埃(Chartier)、J·勒韦尔(Revel)联合主编的《新史学》两书是本编译本的基础与来源。勒高夫的专长是中世纪领域,他的研究注重于长时段的经济、社会、心态史研究,并逐步向历史人类学的方向靠拢。他的研究取向较集中地代表了年鉴学派新发展的潮流。——编译者

20多年来,我们看到科学领域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变革。不仅大多数科学展示着这一历史的加速——这一点本身已是毋庸置疑的了,而且知识的分类也在迅速演进。认识论思考正进一步向深度和广度发展,“认识论”这一名词变得时髦这本身也意味深长。对一系列新被确认为科学实体的学科说来,这一变革的影响尤其突出,而承认这些学科是科学的实体,这已是一个重大的革新。我这里想说的便是人文科学,或按1957年法国大学约定俗成的说法,是人的科学(按英美国家的习惯说法,是社会科学)。有三个现象标志着这一知识的新领域的出现。

1. 一些科学学科的确立。这些学科或以崭新的面目出现或出现已有几十年,但都已超越了大学普及的范围,如社会学、人口学、人类学(正取代着人种学)、动物生态学、生态学、符号学、未来学等;

2. 传统学科的更新。这一更新要么表现在对问题的研究上,要么表现在教学上或两方面兼而有之。一般说来,这些变动往往通过添加“新”或“现代”等修饰词来表示,如现代语言学、新经济史等。现代数学是一个最突出的例子,但它本身并不属于

人文科学的范围；

3. 一些混合学科的产生显示了跨学科性。这些学科或以一个名词加一个形容词联合了两个科学学科，如社会历史学、历史人口学、历史人类学；或以合成新名词来表示，如心理语言学、人种历史学等。跨学科研究甚至超越了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或生命科学)的界限而产生了诸如社会数学、心理生理学、人种精神病学、社会生物学等。

1.1 历史学的独特地位

在这一知识新领域内，有一门科学占据了独特的地位，这就是历史学。今天存在着一种新史学，新史学这一用语本身在1930年就已为它的创始人之一亨利·贝尔所使用^①。历史学的上述独特地位归因于这样两个基本特点：史学的全面革新，史学的革新扎根于古老而坚实的传统之中。许多科学学科的现代化只限于该学科领域的一方面，而未涉及整个学科范围。例如由于人文地理学的发展，地理学便成为以这样的方式取得革新的最早的人文科学之一。继维达尔·德·拉布拉什(1845—1918年)之后，让·勃吕纳(1869—1930年)、阿尔贝·德芒戎(1872—1940年)和儒勒·西戎(1879—1940年)都成为把地理学列入人的科学的推动者，正如新史学从一开始就自称为人(复数的人)的科学一样。应当指出，这些地理学家对新史学的领袖人物——吕西安·费弗尔、马克·布洛赫和费尔南·布罗代尔(1947年，他在高

^① 见H·贝尔的文章，载《历史综合杂志》，第50卷，第19页。在此文中，“新”这一修饰词参照了1912年在美国所发动的新史学运动(New History)，特别是参照了H·E·巴恩斯发表于1919年的文章《心理学和历史学》。

等研究实验学院第六部所领导的研究课题,名为“地理历史学”)有过很大影响。吕西安·费弗尔不止一次指出了人文地理学与历史学之间的这种结合。例如,在他悼念儒勒·西戎和阿尔贝·德芒戎的文章中^①,费弗尔在回忆儒勒·西戎的言论时说,后者要求地理学家“懂得历史学家的专业”,并强调“必须既作为地理学家又作为历史学家来考虑问题”。在纪念马克·布洛赫的文章中,费弗尔说:“……如同我们中的许多人——有的是他的同辈,有的是他的长辈——一样,马克·布洛赫深受这一地理学的重大影响,这一地理学在才智横溢的领袖维达尔·德·拉布拉什的推动下成为硕果累累的学科之一。”^②就是吕西安·费弗尔本人,也在其《地球和人类演进——历史学引进地理学》^③一书中开创了新史学对空间、时间进行同时研究的先例。正是在这一方向下,莫里斯·隆巴尔研究了穆斯林世界的历史。^④

正是在这方面,地图绘制对新史学具有重要的意义。新史学大量绘制和使用各种地图,但这些地图已不再是简单地标明地理方位以及作插图之用,而是试图用空间的长时段演进、量化研究(由其具体地域所体现)和各种解释性假设来进行研究和解释。这是历史学向一个撇开了一切决定论的地理学所作的一次请教。马克·布洛赫在其《法国乡村史的基本特性》^⑤一书中指出,历史是在乡村具体环境及文化系统中形成的。在法国西部,由树林围隔的耕田或草地并非是土地本身的产物,而是人的创造。

① L·费弗尔,“两位地理学家朋友”,载《社会史年鉴》1941年第3卷,收入《为史学而战》,巴黎1953年版。

② L·费弗尔,“马克·布洛赫和斯特拉斯堡”,载《为史学而战》,巴黎1953年版。

③ L·费弗尔,《地球和人类演进——历史学引进地理学》,巴黎1922年版。

④ M·隆巴尔,《首次辉煌时期中的伊斯兰(8—11世纪)》,巴黎1971年版。

⑤ M·布洛赫,《法国乡村史的基本特性》,巴黎1931年版。

任何形式的新史学都试图研究总体历史

历史学并不满足于在这里或那里开辟一些新的视野和新的领域。的确，皮埃尔·古贝尔通过对一个地区100年间有关家庭和个人的全部教区记录所进行的剖析，从人的出生研究到人的死亡，^①为新史学开发了历史人口学领域。的确，纳唐·瓦絮代勒以其成为新史学范本的名著《战败者的观念》^②一书，使史学扩展到范围极其广阔的人种历史学领域。然而，新史学并未满足于这些进展。新史学所表现的是整体的、总体的历史，它所要求的是史学全部领域的更新。此外，新史学在一个领域中的开创性著作，常常以各种方式来表示它们不受任何专业限制的雄心：古贝尔的《博韦人》及瓦絮代勒的《战败者的观念》便是很好的例子：这些都是总体史研究的著作，在这些书中所研究和显示的是一个社会的总体性。在这一方面，历史人类学的杰作，埃马纽埃尔·勒鲁瓦·拉迪里的《1294—1324年间奥克语地区的蒙塔尤村》^③一书便明确表示了新史学的总体研究愿望；也许历史人类学作为扩大了范围的史学的代名词，能更好地表达这一愿望。任何形式的新史学(包括那些装出新样子的史学)及那些表面标有局部研究字样的著作，如保罗·韦纳的社会历史学^④或阿兰·贝桑松的心理分析历史学^⑤等，事实上都是总体史的尝试，是对诸如古希腊、古罗马社会或19甚至20世纪俄国社会进行解释的总体假设。

在谈到1929年创办的《经济·社会史年鉴》这一题目时，吕

① P·古贝尔：《1600—1730年的博韦和博韦人》，巴黎1960年版。

② N·瓦絮代勒：《战败者的观念》，巴黎1971年版。

③ E·勒鲁瓦·拉迪里：《1294—1324年间奥克语地区的蒙塔尤村》，巴黎1975年版。

④ P·韦纳：《面包和杂技团——一种多元政治的历史社会学》，巴黎1976年版。

⑤ A·贝桑松：《被屠杀的沙皇子嗣》，巴黎1967年版。